

（上接A6、A7）

从19岁到44岁 他们一起走进历史

■代表中年纪最大的是44岁的何叔衡，年龄最小的是19岁的刘仁静。

■代表李达是一个“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代表中年龄最小的刘仁静，因大量阅读了英译本的马列著作，能够大段大段背诵马列著作原文，入迷时张口就是“马克思说……”

■关于长沙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在当时流传有一句话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驱；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快报记者 倪宁宁 陈曦

“上海二季”：海归播火者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李达与李汉俊。二人都姓李，巧的是两位都是当时的理论大家。

李达，生于1890年，湖南人。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1912年，考上公费生，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学习采矿冶金。1918年5月因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而参加罢课抗议活动，并作为留日学生救国团体一员回国请愿。为了实现救国愿望，李达放弃了理工科学习，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撰写或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向国内报纸杂志投稿。他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论战主将之一。

1920年春天，李达由东京返沪。当时陈独秀跟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请李达参加。8月，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这也是国内第一个早期的党组织。李达负责编制《共产党月刊》。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上海小组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

据李达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21年2月，陈独秀和李汉俊在商谈党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采用地方分权制问题时，发生分歧。陈主张集权制，李主张分权制。两人通信互相责难，裂痕越来越大。李达调停于两人之间，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代理书记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要李达任代理书记。从这时起到一大召开前，李达一直主持上海的党组织工作。

在张国焘的印象中，“李达是一位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在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李汉俊与李达同年，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学的也是理工科，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研究并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看来，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李汉俊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一批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而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

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和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播火者。

“二老与三小”：人不分长幼

参加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可谓风华正茂。但有6位代表的年龄与这个平均值相差“较远”。其中长沙代表何叔衡年纪最大，生于1877年，44岁；武汉代表董必武生于1886年，36岁；济南代表王尽美，生于1898年，23岁；另一名济南代表邓恩铭，生于1900年，21岁；而年纪最小的北京代表刘仁静，生于1902年，只有19岁。

张国焘曾经在《我的回忆》中，对他们每个人的印象都做了简略的描述：

“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

“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话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详地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会整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其实年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年龄最大的何叔衡，也不过44岁，正是一个人最成熟的年纪。而一提到毛泽东，就会提到何叔衡，这不单是因为他们都来自长沙，更因为长期的共同奋斗，从成立新民学会，到筹办文化书社，从协助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到驱张运动，毛、何都肩并肩站在第一线。在当时流传有一句话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驱；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因为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末期，他在1896年，18岁的时候还考取了秀才。1912年，他来到省城长沙，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科学习，1914年毕业后在长沙楚怡小学和一所附小教书。1918年，他参与发起了新民学会。1919年，和全国各地一样，长沙也掀起了支持北京学生的风暴，那一年他被推选为新民学会的执行委员长。1920年，任通俗教育馆馆长，接办《湖南通俗报》，在他主持下，

该报面貌一新，成为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同年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在长沙的建党工作。

与何叔衡相比，人们更熟悉董必武，他在党内被称为董老。出生于湖北黄安的董必武也是前清的秀才，他的经历，几乎是一部中国的近代史。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董必武从家乡赶到武汉，参了军，并且加入了同盟会。袁世凯篡权，镇压二次革命后，他被迫留学，攻读政法专业。1914年，他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做过兵运工作。1919年春天，他在上海遇到了李汉俊，经李汉俊的引导和介绍，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进步报刊，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董必武参与创办了武汉中学，在武汉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青年传播革命理论。同年秋天，在陈独秀和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与陈潭秋、包惠僧共同发起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与何叔衡、董必武“二老”相比，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要年轻许多，他们三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军”。邓恩铭就读于山东省立一中，王尽美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而刘仁静则来自北京大学。邓恩铭是贵州荔波人，1917年，16岁的他辗转一个多月从家乡来到济南投奔一位远房亲戚。他在第二年考入山东省立一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并作为学生代表赴北京、天津地区开展活动，在那里结识了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年末，回到济南的邓恩铭与王尽美共同发起“励新学社”，创立《励新》半月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他们又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说理会”，在年底，按陈独秀的指示，成立了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

写到邓恩铭，必须提到王尽美，这两位同在济南的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几乎是不可分的。和邓恩铭一样，王尽美也是山东早期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者。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人。1902年出生的他，来上海参加一大的时候，不满20岁，按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位“90后”。

刘仁静天资聪颖，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成为私塾里最小最特殊的弟子。不到10岁时，就考取了县立高等小学，因此被父亲寄予了光大门楣的厚望。

16岁那年，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本想当中学物理老师，因受新思潮影响，后转入哲学系、英文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3日，为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北京各校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北洋政府出动军警抓走178名学生。被激怒的刘仁静，不顾成群军警坚持上街，后被捕入狱。刘仁静从只知道读书，到参与其他，发展到慷慨赴国难不惜入狱，很典型也很引人注意。几十年后，张国焘写回忆录时对此还有印象，他写道：“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



电影《建党伟业》海报，“一大”代表的扮演者们为我们重新展现了那个历史时刻

IC图

那时，进入北大的学生多在20岁左右，刘仁静年龄偏小，个子又矮，在1918年互助社同人合影中，他站在恽代英、林育南等人旁边，尽管挺肚叉腰，仍不免给人以小娃娃在大人身边之感。

这时，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出现在被告席上，又立即以同样的效果引起人们的注意。《晨报》记者特别写了这样一段：“更有学生刘仁静，今年只十余龄，亦与鲁士毅等同被羁押……此一亦为为记者出席旁听席后所侧侧不忘者也。”

在北大，刘仁静先从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再到英文系。社会上什么热，刘仁静就读什么。因大量阅读了英译本的马列著作，能够大段大段背诵马列著作原文，入迷时张口就是“马克思说……”因博览马列群书，刘仁静得到了陈独秀和李大到的器重。

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会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举座皆惊，众人对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思”。

1920年10月，刘仁静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参会的刘仁静表现得十分活跃，还以初中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整整整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下《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让在场的其他人瞠目结舌。

陈潭秋、包惠僧：两个黄冈老乡

在参加一大的代表中，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都是湖北人，这多少显示了湖北，特别是武汉在建党事业中的重要性。在这其中，陈潭秋与包惠僧都是湖北黄冈人，是不折不扣的老乡。

陈潭秋，出生于1896年。1913年，他考取了武昌省立一中，后进入武昌高等师范英文系学习，1919年毕业。1919年，五四运动的火种也

传播到武汉。5月18日，在武汉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3000多学生走上了街头。陈潭秋带领武昌高师英语部学生，手持“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抵制日货”、“誓雪国耻”等各色标语，沿途散发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宣言和传单。这年夏天，陈潭秋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参观团，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他结识了一生的挚友董必武。也在那个时候，同是湖北人的李汉俊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到上海。此时的李汉俊已经在思想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向他的湖北老乡谈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介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一些进步读物和报刊。

在上海，陈潭秋、李汉俊、董必武反复对比研究了中国和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和董必武一样，此次上海之行，陈潭秋理清了许多概念，在众多学术思潮中，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年8月，陈潭秋和董必武回到了武汉，开始传播社会主义学说。

包惠僧出生于1895年，家里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三。1912年，包惠僧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文科，1917年夏学成毕业。按道理说，成绩好的毕业生可以留在一师附属小学教书，包惠僧成绩虽很好，人缘却很差，所以不能留校。第二年，他总算托人找到了一份小学教职。但是这所小镇上的小学，校务被当地豪绅把持，对他们恶性劣迹早有耳闻的包惠僧，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地在一次会议上拍案而起，把豪绅们大骂了一顿。这下捅了马蜂窝，包惠僧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包惠僧回到武汉，继续找工作。机缘巧合的是，他在旅馆遇到了一位新闻记者，这位感觉良好的记者向他灌输了一套搞新闻的“混世法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走投无路的包惠僧开始给武汉的《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投起稿来。半个月后，他竟然得到了这两家报纸的特约外勤记者证。外勤记者没有工资，只有稿费，收入自然不高。

1919年春天，包惠僧离开武汉，前往北京，在北大中文系旁听，同时担任两家报纸的外勤记者。同年冬天，回到武汉的包惠僧与陈潭秋不期而遇。原来陈潭秋在上海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到武汉后，他和董必武商定“办报纸、办学校、鼓吹革命”，于是他也成了《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的编辑，也就是包惠僧的同事。虽然是朝夕相处的同事，甚至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感，但那个时候的包惠僧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原则性特别强的陈潭秋和他并没有深交。

党的的一大，但他并不是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的。他是陈独秀的特派代表。当时包惠僧不在武汉，在广州。当广州小组接到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党的一大的邀请信时，在一次会议上，陈独秀指示由陈公博代表广州小组参加，而包惠僧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参加。这再一次证明了陈独秀对包惠僧的重视。

周佛海与陈公博：另一种类型

代表中的周佛海和陈公博则是另一种类型。

刘仁静对二人印象不佳，“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上海南京路上豪华的大旅馆里，举止阔绰。周佛海则在开会期间不忘谈恋爱，甚至还引来了桃色纠纷。他们的表现当时就使其他代表不以为然，我就没有到大东旅社去看陈公博。就会议上的表现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据张国焘回忆，“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倜傥，倒像是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代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事实上，陈公博并没有参加完会议全程。在会议被逮捕盯上，很快便离开了上海。

周佛海在回忆中说：“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追捕走后，他怕有人盯梢，才回旅馆。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枪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陈公博夫妇，真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在《寒风集》中回忆当时情形。“我说隔壁出了命案，我的太太非常惧怕，所以今日要去杭州一行，把所有行李，暂存旅馆，俟回来还要换一个房间。”“经过昨天的变故，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我更可以从容地游西湖，逛灵隐了。”“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开了一枪，而孔女士居然不死，那男的急了，所以又用毛巾去勒……”从杭州返回上海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至此结束。”

周佛海在他撰写的回忆录《扶桑发影溯当年》中，谈及当时参加一大的原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动机，就是政治野心。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蒙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

在其他代表眼里，陈公博和周佛海似乎和大家格格不入，但是客观地说，在当时，作为广州和旅日小组的代表，这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头头是道。在《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书中，选择了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多篇文章。

陈公博在《广州一年来的劳工运动》一文中详述了广州工人运动的状况，行文冷静、客观，但又不乏激情：“排除资本家，排除政客，自己教育，我们工人啊！我们快快起来大联合！”而从周佛海一篇名为《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文章中，可以清晰地体察到作者的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为救现代社会一切恶弊的万能药，恐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良心上也是承认的。”

可以这么说，1921年一大召开之际，陈公博、周佛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当时中国的现实也选择了他们。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中共一大代表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

